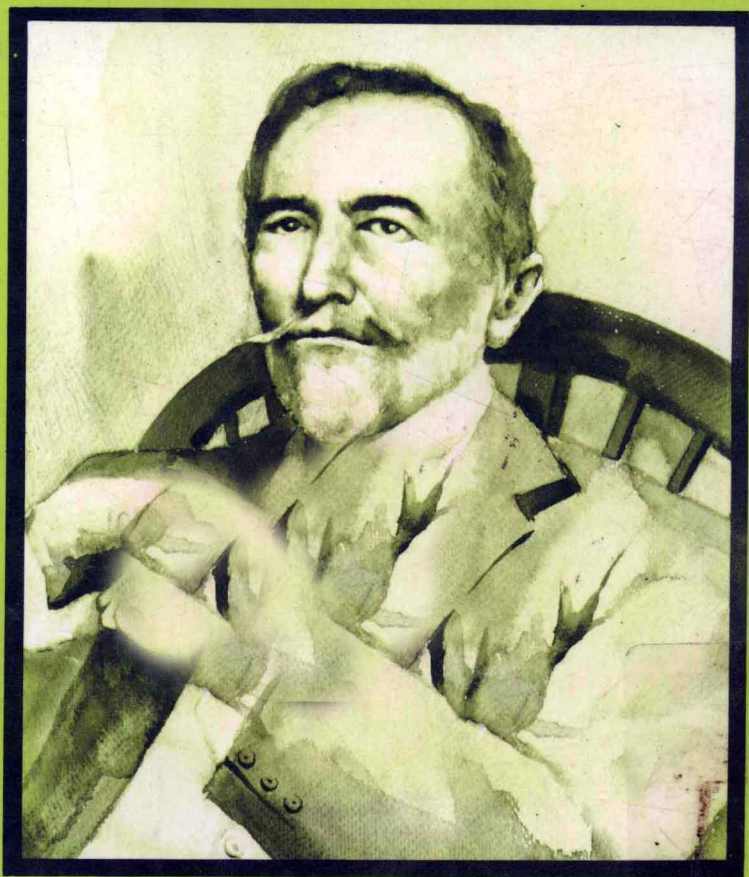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75

吉姆爺

康拉德 著 陳蒼多 譯



吉姆爺

康拉德 著
陳蒼多 譯

— 遠景精選版 —

吉 姆 爺

世界文學全集 R⁽⁷⁵⁾

著 者	康	拉	德
譯 者	陳	蒼	多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 6 — 5 7 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電 話：3 9 4 — 1 9 6 0		
印刷所	其 宗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環 河 南 街 二 段 113 巷 7 弄 16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120 元 港 幣 20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70 年 3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

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約瑟夫·康拉德的生平與「吉姆爺」



英國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雖然已經逝世三十六年，但他的聲譽不但沒有衰落，反而與日俱增，他在文學方面的影響也愈來愈大，研究康拉德的文章專書也愈來愈多。康拉德原是波蘭人，後來歸化英國。不過他對祖國的懷戀終生未衰。這篇文章的作者米羅茲（Czesław Miłosz）也是波蘭人，是當代波蘭的最著名的流亡作家，現住巴黎。

一位作家的作品可以說像一座冰山。我們能看得見的那一小部分誘使我們去探索隱藏於文字後邊的那一大部分東西。對文學史家而言，這種誘惑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因為他們必須研究一位作家的個人生活，個人經驗中的重要和錯綜複雜的事件，這些事件影響了他的感性，決定了他的生活的目的。如果一位作家出生於一個不為一般人所了解或了解不完全的國家，這種研究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了。約瑟夫·康拉德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於一百多年前誕生在波屬烏克蘭。他的人格中有許多安格魯薩克遜讀者看來頗為奇異而神秘的因素。但是在他的同胞，在一個熟習他的

青年時代歷史——他的改變生活方式而去航海前的那一段歷史——的人看來，就毫無奇異與神秘了。

所有康拉德的傳記通常都說他生在一個貴族的家庭。這會使讀者想像到一個鄉村別墅，馬、狗和某些貴族生活的特色。實際情形並非如此，雖然他的祖父是拿破崙麾下的一位軍官和舊式的族長，的確可以歸納於傳統的貴族階級中。但對康拉德個人生活更適切的一個事實，是他父親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是位窮詩人。他在波蘭文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的詩劇一直到今天還在波蘭演出。康拉德的舅父包勃羅斯基也是位文人，是十九世紀一部最有趣的回憶錄的作者。這位未來的英國小說家生長的環境是個文學的環境。

一八五六年，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得了個兒子，他給他取了個名字叫約瑟夫·狄奧多·康拉德。任何波蘭人對「康拉德」這個字的象徵意義都很清楚。因為以前有個叫康拉德的波蘭人象徵着抵抗俄國的戰士。要想知道它如何得到了這樣的意義，我們必須了解亞當·米茲開維支（波蘭大詩人，與普希金同時）的詩，他的詩每個波蘭人都能背誦出來。他的最著名的詩中有一首是「康拉德·華林洛德」。在這首詩裏，他把波蘭人的愛國精神和反抗俄國的情緒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偽裝，以騙過沙皇的檢查（一八二四年，他被送往俄國，因為沙皇懷疑他有革命行動），他用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史詩來偽裝它，他回溯到中世紀的日耳曼條頓武士團同異教徒立陶宛人之戰爭。康拉德是個皈依基督教的異教徒，升為武士團的領袖，故意把武士團的部隊領進一個陷阱中，來為他的受盡苦難的同胞復仇。他的復仇是經由一種可怕的欺詐，但這是被壓迫者的唯一武器。

這樣，約瑟夫·康拉德從嬰兒時期就有一個浸漬於波蘭傳統中的名字。他出版第一本書時只寫「康拉德」而略去了他的姓，因為他認為這個姓對安格魯薩克遜讀者太難念，一方面他也知道康拉德這個名字的含意。

康拉德誕生在克里米亞戰爭剛剛結束後的第一年，那個戰爭動搖了俄國的國本，給波蘭人一種希望，覺得從沙皇鐵蹄下獲得自由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康拉德的父認認為寫詩並無助於波蘭獨立，他投筆而從事革命活動，成爲一個「叛徒」，一八六一年，他成爲華沙秘密室革命委員會的委員。

那一年，他父親被捕是件極重要的事，因為對青年康拉德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在從五歲到十歲這段最易受感動的年齡（一個人的個性正在凝固的年齡），他發覺自己是位政治犯的兒子。父親先在華沙城堡中被關了幾個月，在這兒，沙皇的鷹犬們迫他說出他的同志們的名字。失敗之後，他們把他判處放逐俄國北部。他的妻子和小康拉德陪他同行。坐着馬車，在武裝兵士的監護下，這段東行的旅程是既長且痛苦的，他們快到莫斯科時，小康拉德患了重病。

我們知道，一個孩子對於大人遭遇的不平凡的事件特別敏感，而他對這事件的意義又不能明瞭。在這水天雪地的北方，要想掩飾這一家人所遭遇的不幸更格外困難。幾個月過去了，在這段時間，父親和母親間的偉大愛情染有一種無可奈何的絕望，他們被放逐於瓦洛達，這地方的氣候漸漸毀掉了伊芙林娜·康吉尼奧斯基的健康。「瓦洛達」，她的丈夫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是一大片沼澤之地，長有三公里，上面是交錯的木頭鋪成的小路。一年可以分爲兩季；炎熱的、

夏天和碧綠的冬天，炎熱的夏天長達九個半月，碧綠的冬天有兩個半月。」季節轉移，母親、父親和兒子也在毫無一絲希望和令人絕望的希望之間擺盪——他們請求沙皇把他們改放逐到一個天氣比較不太惡劣的地方，甚至希望沙皇可能答應他們的請求。這請求最後送到沙皇的政府，允許他們往南移，到俄屬烏克蘭的一個名叫車尼戈夫的小城。但時間太晚，已經不能挽救病重的伊芙林娜了，一八六五年她與世長辭，小康拉德才八歲。

妻子逝世後，唐吉尼奧斯基變得更爲孤獨，他現在背負着雙重悲傷。因爲在他失掉可愛的妻子之前，就已經看到他曾爲之獻身的革命受到的致命打擊。在一八六三年，醞釀已久的背叛終於在波蘭爆發，且被俄國人殘酷地消滅。受到這雙重打擊之後，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想強使自己心情平靜下來，對於一位天性熱情的詩人而言，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兒子也不可能經歷到對於一個孩子甚爲重要的童年的快樂。這個孩子的唯一能逃脫痛苦與憂鬱的時刻是在夏季，他可以同親戚們到烏克蘭的鄉村中去旅行，因爲這孩子不是囚徒。但冬季是長的，是淒涼的，晚上，康拉德的唯一的伴侶是他的父親，父親坐在油燈下，以潦草的有稜有角的字一頁一頁地寫個不停。甚至就在這時候，所有的希望都被摧毀，這位不屈的被俘者仍繼續對沙皇制度孤軍奮戰。

在長長的冬夜油燈下的產品，有篇論文叫做「波蘭與俄國」。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設法偷運到外國，發表在波蘭移民在來比錫辦的「祖國」報上，他並沒有署名。正如我們所能想得到的，這篇文章控告俄國人的「野蠻」，這種野蠻「由寒海延伸到黑海，由維斯杜拉河延伸到太平洋

「，它有無數陰森森的預兆。「這就是俄羅斯的情形，」有一段說：「由於害怕她自己的毀滅，就被迫向外侵略。雖然歐洲在短時期還不會受到這種侵略，到那侵略來臨之時，歐洲就無法躲避了；那時俄國會選擇她行動的時間。歐洲的力量便會被剝奪一半。」

在這些年代裏，康拉德的父親是他的主要的教師，他們被放逐到外鄉，生活在處處受壓制的環境裡，必然會加強了父子間的關係。從他父親信裏，我們知道他早年教育的內容。（「我盡我的所能教育他，不幸這是不够的。我保護他，不使他受到這兒的氣氛薰染。這孩子好像是在一個修道院的小室中生長。」）但我們可以有相當把握地假定：康拉德從他父親那裏，從他少年時代的不幸的生活環境中得到了對俄國的根深蒂固的憎惡，和他對於生活的悲觀看法，在他後期作品中，這種態度是極明顯的。

約瑟夫·康拉德憎恨俄國的情緒是人人皆知的，不必在這兒強調了。美國的文學批評家H·L·門肯在一篇文章裏說，他在康拉德的小說中發現了典型的斯拉夫氣質，康拉德非常生氣。他說波蘭人和斯拉夫人的不同，不僅是波蘭人恨俄國人，也是因為這兩個民族的特性的水火不相容。他又說他只讀過幾本俄國小說——讀的還是譯本，並且強調說：「他們的心性和感情永遠使我憎惡，這是由於遺傳的傾向和我個人的氣質的關係。」

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對於兒子的影響不僅限於政治方面。這位父親的作品中有一種顯著的特質，即對人性的基本懷疑。他的心頭永遠籠罩着一種陰沉沉的思想，他看到一種咄咄迫人的力量從原始的混亂冉冉升起，它掩住並且要推翻文明人。他對俄國的恐懼是一種對於醜惡的原始力

量的恐懼，因為這種力量是道德慣例不能拘束的，不能處置的。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信仰從父親的論文中繼續擴延到兒子的小說裏。康拉德的「秘探」和「在西方人的觀察下」裏，無論沙皇的官員，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都不承認這個單純的規則，即「一個人不做那種事」。

在「黑暗之心」裏，販賣象牙的商人克爾茲（即庫茲——譯者）屈服於非洲的紊亂，受到一陣道德破裂，當他公然宣布白人的文明的使命時，參加了對於土人的大屠殺。這種認為人在一層薄的文明面罩下被其本能所傷毀的感情，也為湯姆斯·曼所共有，所以曼認為康拉德是二十世紀的一位真正的前驅作家。

妻子死後，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知道他也不會活得長久了，因為他患有肺病。他在信中透露出他對他的獨生子感到的焦慮不安，因為不久這孩子就要在世界上成爲一個孤苦的人了。「我的健康日衰，只有我這個可愛的孩子照顧我，」他在一封給朋友的信裏說，「如果我能看到康拉德回到祖國的土地上，同好人生活在一起，能把這個活的身體和覺醒的靈魂連繫到我們的社會上，我就不希望其他東西了。至於我自己，我只希望能腳踏祖國故土，呼吸故國的空氣，望着我所愛的人們，高聲呼喚：『主啊，讓您的忠僕在寧靜中離開。』」

因爲他的親戚們的努力奔走和他的嚴重肺病，最後他獲得釋放。一八六七年他得到從俄國到瑪德利拉（Madera）的旅行護照。他帶着兒子，跨過邊境，到了奧匈帝國境內。在這兒，他竟放棄了旅行計畫，主要是因爲他沒有旅費，但也是因爲他對卡利沙（講波蘭語的一省，曾併入哈

波斯堡帝國(The Hapsburg Empire)地方的波蘭文學運動發生了濃厚興趣。父子二人先安置在勒服夫(Lwow, 即勒謨堡Lemberg), 後來又移居克拉科(Cracow)。跨過俄羅斯帝國邊境後兩年, 阿波羅·康吉尼奧斯基逝世。所有克拉科的居民都參加了葬禮。這位老革命家接受了一種英雄的葬禮, 送殯的老百姓把這葬禮行列變成了一個愛國的示威運動。

父親死後, 康拉德成爲孤兒, 那時他才十二歲。此後他的保護人便是他舅父包勃羅斯基, 康拉德發現他掙扎於兩種影響之間。他的舅父完全同他父親相反, 他不斷地努力壓制康拉德所繼承的一切「較壞」的性格, 這種壓制有時是不快意的。康拉德的傳記作者絕不能低估這種精神上的衝突, 因爲這位舅父對外甥的影響是持續得很久了, 康拉德在英國船上航海時, 這種影響還在繼續着。

包勃羅斯基的回憶錄顯示出他是一個有堅強信心的聰明的學者。這位自由主義的保守派是位有譏諷感的現實主義者。他對革命的「夢想」取敵視態度, 他斥責國人的公開反抗沙皇主義, 促使他們採取一條漸進的道路, 希望能在俄羅斯帝國內得到某種程度的自治。他認爲康吉尼奧斯基家的人都是冒險家和經濟上的失敗者。他認爲阿波羅同他的兩兄弟一樣, 染有這一家族的瑕疵(他們都喜歡酗酒與賭博), 只是因爲阿波羅是位詩人。更壞的是, 康吉尼奧斯基三兄弟都參加了革命運動, 都成爲革命的犧牲者。他們之中一位死於戰場, 一位死於西伯利亞, 一位在放逐中染上肺病。包勃羅斯基認爲這是對夢幻家的懲罰。因此, 從這孩子的精神中剔除這種有毒的遺傳氣質, 就成爲必要。

這位嚴肅而克己的舅父曾以幾年的時光不停地寫一個備忘錄, 叫做「給我的母愛的外甥康拉

德·康吉尼奧斯基讀」。這一記錄中大半都是數目字，從康吉尼奧斯基家的記錄中抽選出來的帳目——這些數目字是爲了給康吉尼奧斯基家族的最後一朵花注入一種印象，使他了解這一家族的罪，警告他不可浪費，給他健全公正的忠告。

舅父與父親的兩種強有力的人格衝突，對於解釋何以康拉德的性格中有那些矛盾，是有很大的幫助的，這些矛盾可以稱之反浪漫主義，他把波蘭人的愛國精神同對波蘭革命的懷疑態度奇異地結合一起，他愛冒險同時又有自律克己的修養。

舅父的焦慮不安並非無因的。康拉德早年在父親管教下讀書，沒有同年紀的伴侶，以及家庭的悲慘情況，養成了他的愛孤獨的習慣，對於一個「社會中有用分子」而言，這種習慣是不好的。這孩子被允許閱讀所有他能夠得到的書，所以他大量閱讀波蘭浪漫詩人的詩，雨果的小說，和莎士比亞的劇本的譯本，據說他十一歲的時候就寫了劇本，在大人協助下演出。但他對於學校中任何規則都不願遵守，對功課也不熱心。他的親戚叫他是「逃避者」。

這位年輕的自我主義者的早熟使得他周圍的人們不高興他——他從來不掩飾對這些人的輕視。他的一些傳記作者說他在克洛科念完了八年的中學，另外一些事實則證明他並沒有受這麼多的教育——當時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受到這些教育才算合格。他的一位表姐曾有如下的記載，說明她對他的印象：「在知識方面是很豐富的；他痛恨學校的一切規則，這些規則使他痛苦，使他厭倦。他常常說他有很高的智慧，他要成爲一位偉大作家。他這樣自負和他臉上帶出的譏諷的表情，時常對別人的批評，使教授們感到驚訝，同伴們故意嘲弄他。在任何方面他都不約束自己。在

家裏，在學校，在別人家作客，他都懶洋洋的半躺半臥。如果他得到了一些必要的知識，那主要是由於他就己之所好而讀的那些書和他的私人教師——克拉科的一位醫學院的學生，叫做亞當·波爾曼。十六歲的時候，他和波爾曼到西歐旅行，在瑞士漫遊三個月。

不只是康拉德的名譽，還有他的作品中的嚴格的聲音——一種道德的聲音，對於他那些克拉科的舊識，一定是一種驚訝。某些人所經歷的那些變化，對於在生活上太接近他們的人，是不易被了解的，因為他們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這些性格中的特徵視爲一種固定不變的化學合成物。但這些相同的人格因素也會重新組合，不斷地變成新的結合物。這種變化所需的是經驗，這些經驗能摧毀一個定型，準備一個新的綜合。康拉德的這種經驗就是他在英國海軍中的長期服役。

這位對人淡漠的青年宣稱他將成爲一位偉大作家時，他的親戚們認爲這只不過是另一種虛榮的證明而已。當他說他要成爲一位水手時，他們也是姑妄聽之，正如聽一個孩子說他要做消防隊員和火車司機一樣。在一個大陸國家，做水手只是一種妄想，他的倔強使他的親戚們擔心。

康拉德的醉心於海，曾使一些文學史家吵鬧不休。他們曾想，康拉德的愛海可能是由於讀雨果的「海上的艱苦工作者」的刺激，他在兒童時代讀過這本書，或是俄國海港奧德薩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和舅父來這兒度過假日。也有人想，他做水手的夢想也許是由於他要逃開波蘭這一陷阱的希望。所有這些都是揣測。康拉德是位極聰明的人，他在自己的感情與出版的作品之間放了一個過濾器，他的作品似乎毫無「誠實」，我們只能間接地從他的感情中辨識出一種繫繞心頭而不去的概念。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幾個的人物似乎是大陸反叛者的化身——那些

大無畏的心底純潔的武士僞裝成馬西亞的會長或船長，好像要解釋一句格言：「生存於藝術中者必在實際生活中死亡。」

他的親戚們既然對航海懷有敵視之意，爲甚麼最後又屈服於這位少年的固執呢？也許他們覺得同他論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們找到一個折衷的解決辦法：他們在談論着把他送到普拉地方的哈波斯堡海軍學校。這一計畫是不可能的，因爲他不是奧國公民。雖然住在克拉科，這孩子登記爲俄國公民。直到現在還不爲人所知的一段傳記（一九五六年波蘭印行）的材料可以證明他舅父改了態度。這個已經給他添了不少麻煩的孩子又和表妹苔克拉·梭羅芝斯卡搞戀愛，弄得亂七八糟。把他盡可能送到遙遠的地方去，實爲安全之策。希望他能荒唐一陣子，然後帶着懺悔的心回來。他舅父答應每年給他兩千法郎，那時這已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這位冒險家便於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啓程去馬賽。

康拉德是位英國作家，波蘭人從來不會把他同化於波蘭文學中，正如他們不會把法國詩人阿波林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算做波蘭詩人，雖然他的真實的姓爲康斯托維基（Kostrowicki）。大不列顛，經由她的船隻，賜予了這個水手他所缺乏的東西：對於生命鬭爭之理解，和對人在面對殘酷的大自然時表現之同情的了解。他也學會了英國語言。他說得並不好，一口外國腔，但在寫作中，使他成爲一個文化移植中的罕見的現象——那時他已是成人了！

如果那奇異的海洋和他在航海時到過的大洲給他一種原始的想像，如果康拉德開始時就已熟習了這個較大的世界，我們就容易了解這一現象了。如果他生長農村，來自農家，他所得到的那

些新觀念和新印象就可能以一種新習得的語文立刻雕刻在一片空白的平板上。但康拉德是屬於文學型的。他在書堆裏長大，了解波蘭的詩，他醉心於詩甚於對其他學問的研究。波蘭讀者在讀他的書時，經常聽到一些熟習的聲音，因而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某些主題，某些小說中整段的節奏，會使讀者憶起某些詩句，稍加思索，就會指示這段文字的來源。康拉德把兩種文學和兩種文明很完善地融於一爐了。

康拉德深深醉心於英國語言，從他的措辭中，我們可以推測他發現了一種最適合他的氣質的工具。他以波蘭文字寫給他舅父的信，對於亞非海港的有趣描寫是驚人的。但他舅父要他給波蘭刊物寫文章的事，則失敗了。很奇怪，舅父想抵制外甥的疏遠波蘭，在他的辯論中竟把他的父親也抬了出來。在一八六一年寫的一封信中，他說：「因為你沒有忘記波蘭人（願上帝賜福你；我已經為你祝福了），又因為你能寫得很好，我必須把以前說過的話再提一遍：如果你能給在華沙出版的雜誌 *Wiedowlec* 寫文章，就太好了。我相信每個人對你所寫的東西都會發生極大的興趣。這樣你就可以同你的祖國加強連繫，這樣做對於你的亡父也是一種孝敬，他想以筆報國，也那樣做了。」

一個移民外國的人爲了自衛，常常完全同他的祖國斷絕關係，或者對祖國表示一種友善的謙遜，因之他的成功和被遺在祖國的同胞所受的苦難成爲鮮明對比。在美國的愛爾蘭人，意大利人，波蘭人中不乏這樣的例子。如果在康拉德身上可能發現這種傾向的話，那就說明這問題已經失掉其尖銳性，在分析他的作品時就可以不再注意這一問題。事實上，這件事並不如此單純。我

們進一步研究分析他的傳記材料時，會得到一種結論，即一種小心地隱藏起來的叛國心情在他某些作品中是可辨識出來的——這種感情顯示他已經背叛了他的同胞和他父親爲之獻身的正義。

波蘭人和俄國人對於文學的看法和西歐不同，他們從傳統上就把文學看做改善社會的武器——這兩個極端不同的國家相同的性質不多，但這是其一。康拉德對於波蘭前途殊少信心，這給了他一種自辯的理由。但無論有多麼充足的藉口，都不能把我們同我們的選擇正確的懷疑隔離起來。

康拉德的書使他在外國享盛名之後，他的親戚們把華沙文學界對這些作品的批評文章剪寄給他。波蘭的報紙不是都歌頌他的。康拉德對伊麗莎·奧吉斯克 (Eliza Orzeszko) 的猛烈攻擊甚爲不快。這位婦人——提倡婦女參政者——是位很受尊敬的人道主義的小說家，繼承孔德的傳統（那時孔德被認爲是歐洲的先知）。她公開指斥康拉德爲叛徒，因爲他把天才獻給外國的文學。

分析一本小說中一層一層的意義的過程是件費心不討好的工作。但康拉德的意義曖昧不明的「吉姆爺」無疑得到了額外的意義，如某些批評家所提示的，如果我們能從裏邊看到一種民族忠貞的戲劇。一個水手離開了他的廢船。知道救這船已經無望，這一行動的結果終生追蹤着他。如果我們把這船的名字 *Patna* 改成 *Patia*，我們就可以得到多種意義，給他的散文一種神秘的美。即使我們原諒這種對祖國的依戀（只有在中歐和東歐才見到的那種依戀的程度），這種推究也是危險的，像康拉德這樣好隱匿自己情感的作家，是不會鼓勵這種依戀的表現的。

雖然他同一個英國女人結了婚，但他對英國的依附仍是不完整的。在哲西·康拉德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發現「東歐人」的經常拜訪給她的那種有趣的恐懼，她丈夫的大部分的生活是她不

能「介入」的，使她感到懊悔。我們推想，在同她的和他的英國朋友來往時，康拉德一定運用了某種技巧。他對自己不熟悉的問題和事物，總是保持沉默。這對他較好的，因為他之願意長住英國是他個人的選擇。英國和他最討厭的兩個大陸國家——俄國與德國——對立時，他忠心支持英國。雖然他自願做英國人，但他又經常強調他的既忠於祖國又忠於英國，表明他並不願放棄這種雙重的忠貞。他的朋友葛蘭姆請他參加一八九九年在倫敦舉行的和平主義者會議時，他的回信中有下面的一句，而且字旁密加圈：「這會議中會有俄國人參加。不可能！」他又說他不能接受所謂博愛的觀念，這並非因為他認為這種理想不易實現，而是因為宣揚博愛可能減弱「民族情感」，而「我現在的成見就是要保存這種民族情感」。

如果我們把「世界主義」這一名詞的真實意義從共產黨的曲解中解放出來，恢復其真意，我們知道它有好的性質，也有壞的性質。康拉德雖然到過很多地方，寫過很多講不同語言的人，但他不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不可能成為世界主義者，因為他需要根。但他知道如何在其雙重忠貞間保持某種程度的平衡。一九〇三年他給一位波蘭朋友寫信說：「如果你能相信我的話，我可以這樣說，在我航行世界的途中，無論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我從未離開過我的祖國，我希望波蘭把我當作一個愛國的公民接待我，雖然我已歸化英國。」

二十世紀開始時出版的「黑暗之心」是一個預言者的高喊，宣佈維多利亞的歐洲在它自己改變為狂暴的歐洲時，正趨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它摧毀了許多幻想。康拉德對於無政府狀態的恐懼在這方面表現了憂鬱的肯定。同時這場戰爭又掀起了新的希望，許多自